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2.001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与贡献

段治文,刘宏伟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毛泽东是探索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先驱。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把握文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沿着“民众大联合——建设中华民族的新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进程,为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形态做出了不懈努力。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逻辑中,毛泽东积极探寻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道路,既主张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又强调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脉络中,毛泽东以文明互鉴的理性观念观照世界文明,并基于民族本位汲取世界文明成果,有力地推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毛泽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2-0001-07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历史实践的具体发展、文化传统的深厚根基以及融通中外的世界视野。毛泽东在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依循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及现实要求,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内涵更新和现代转型,进而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深刻把握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与贡献,有助于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本质,也能为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重要的方法遵循和价值旨归。

一 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首要目标。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

程中,深信“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②,先后提出“民众的大联合”“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等文明建设目标,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探索之路。

其一,毛泽东基于人民本位,力图以“民众的大联合”为根本途径探求中华文明复兴之路。历史是文明生成的依托,文明是历史发展的凝聚和积累,历史创造的主体也是文明创造的主体^③。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便注重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民众的大联合”视为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方法,借此表达中华民族的自主性诉求。辛亥革命后,所谓的民主共和并未实现,国家仍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④。对此,毛泽东沉思道:“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

收稿日期:2023-1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19VFX001)

作者简介:段治文(1964—),男,浙江常山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页。

③陈金龙:《毛泽东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奠基》,《毛泽东研究》2023年第5期。

④《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01页。

大联合。”^①而根本上的变革必然要有所依托,毛泽东进一步以“竖看历史”的方法,指出历史上的运动“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而“到了近世,强权者,贵族,资本家的联合到了极点”,“于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②。特别是法兰西及俄罗斯通过“民众的大联合”取得了“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胜利,证明联合的手段是可以“普及于世界”的。可见,以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世界革命的普遍性为立足点,乃是毛泽东探索民众大联合现实路径的显著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详细阐明了“民众大联合”的社会基础:就人数而言,“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就社会关系而言,民众同军营里的兵士有着密切关联,“反一齐化成了抵抗贵族和资本家的健将”;再加上,民众“已将贵族资本家三种法子窥破”^③,认识到阶级差异和剥削逻辑的根本所在,故而能够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由许多小的联合,进为一个大的联合”^④。不难看出,毛泽东已认识到阶级产生的根源并力图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社会问题,不仅基于历史发展脉络揭示出“民众大联合”的实践路径,而且将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景同民众实现切身利益的现实需要紧密联系,开始探索通过聚合人民群众的历史伟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思路、新方法。

其二,毛泽东立足民族本位,旨在“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然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基本前提。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以及深厚的历史情怀,在他看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是“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⑥,只是近代帝国列强同封建阶级相勾结,“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⑦。故而,救亡图存的生存境遇“要求全国人

民,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担负起坚决奋斗的责任”^⑧。为此,毛泽东毅然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全国陷入白色恐怖的形势下仍未丧失理想信念,并以现实条件为基础,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探索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进而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在抗战时期,他更是基于历史经验,指出“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⑨,强调以“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振奋民族志气、激发民族斗志。在斗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毛泽东更是敏锐地觉察到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物质上“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更是“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⑩。因此,他直指抗战胜利的核心要义,即唤起全民族的团结,提高全民族自觉的能动性。推翻“三座大山”后,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政协会议上,更是以“全国人民大团结”为主题,宣告“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家庭……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⑪。不难看出,毛泽东在革命年代始终坚信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⑫,并坚持在民族本位的基础上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路径,亦即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性质、中国实际的实践活力以及中华文化的民族根脉之上,集中体现了其强烈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

其三,毛泽东运用唯物史观诠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313页。

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314页。

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5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2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5页。

⑪《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345页。

⑫《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毛泽东认定社会主义是现代文明的突出表征,进而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努力目标,借此进一步揭示中华民族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光明前景。正如李大钊所言:“社会主义的社会……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②同样,毛泽东依据唯物史观所明示的社会主义方向,指出新中国的成立“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③,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是中华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努力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贯彻落实民族复兴伟业“上篇”的思想^④,确立以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并提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⑤,成功开辟出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⑥。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期待,实质上是对现代文明的向往,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现代文明建设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此后,针对苏联模式弊端的逐渐暴露以及全面照搬苏联经验带来的“水土不服”问题,毛泽东强调以苏为戒、以苏为鉴,在 1956 年 4 月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⑦,进而创造性地提出“第二次结合”的问题,倡导把共同规律和民族特点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9 年 12 月,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更是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语境中更新了现代化概念的具体内涵。毛泽东基于唯物史观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昭示出现代文明国家建设的前进方向,为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的格局中建构崭新的现代文明开

辟了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尽管毛泽东没有明确使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但从其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民众大联合—建设中华民族的新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彰显出他在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基本形态的不懈努力。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始终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上探寻现代文明的转型道路,并且不仅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⑨,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的发展,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与现代化转型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

二 在“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逻辑中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⑩文明和文化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文化是文明的内在基础,文明是文化的外在表现。毛泽东将文化的改造与文明的发展作为思考的重点,在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塑造集体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解决问题的实践探索中深度结合,有力地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其一,毛泽东倡导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文明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历史文化遗产又是传统文明的显著表征。对此,毛泽东主张学用合一,即在“批判地继承”基础上“有区别地加以利用”历史文化遗产^⑪,不仅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②《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④毛泽东形象地将民族复兴伟业分为两个阶段,并将之称为“文章”的上、下篇。需要说明的是,在革命时期,毛泽东便指明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即“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⑧《毛泽东年谱(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270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⑩习近平:《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⑪《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

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①,而且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以深厚底蕴。新文化运动将锋芒指向封建礼教,认为民族的衰微,全在于传统文化的保守与腐败,故而决意在同“旧我”决裂的过程中寻找真理。诚如陈独秀所言:“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②但在毛泽东的认识视域中,传统并非一个与现代截然对立的范畴,尽管民族文化遗产的整个体系是封建的,但其中也包含着积极合理的部分。因而,他倡导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文化遗产,亦即在尊重历史延续性和文化继承性的基础上,“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③。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这一经典论述,并且强调这“不是颂古非今”,也“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而是“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④,以此为建设一个新文化引领、文明先进的中国奠定文化基础。质言之,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只有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脉之上,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才能朝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特质及趋势,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图在文化的深层次变迁中实现中华文明由古代向现代的机制转换,使中华文明再次绽放时代光彩。

其二,毛泽东强调以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支撑,标示着中国人民对传统文明的重大集体觉悟和文化自觉。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论述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智慧。从理论高度来看,中华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⑤,而“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⑥。由此,中华文化独特的民族性和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共同构成中华文

明具备文化主体性的现实根基和历史语境。基于对中华文明特有的民族气质、文化特色及价值理念的深刻认识,毛泽东进一步将“发展民族新文化”同“提高民族自信心”^⑦并列提出,彰显其精妙的辩证法思维。具体言之,一方面发展新文化有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另一方面民族自信心又是发展新文化的重要条件,而二者交互发展共同作用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历程之中。不难看出,毛泽东详细阐明了中国文化转型和发展的现实路径,力图唤醒在苦难中汇聚而成的民族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这一思想更是反映在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对“文化运动”的重视,强调“没有抗日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以与总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抗日也是不能胜利的”^⑧。在文化主体性的高度自觉中,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的表现形式,激活传统文化在时代语境中的理论生命力,乃是毛泽东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显著特质。

其三,毛泽东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路径。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达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中华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建立文明先进之中国的必然要求^⑨。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内化于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目的在于发展具有现代品格的民族新文化。这不仅使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服务于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而且为中国人民重塑民族自信心、开创民族新文化提供了现实基础。譬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承继中国古代的朴素辩证法,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有机地融合,以民族的思维方式论证唯物辩证法,不仅克服传统辩证思维的直观性和朴素性,而且更加贴近中国现实和民族的文化心理。又譬如,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以“实事求是”的传统话语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文化观上既立足于传统文化,又朝着突破旧有传统的架构,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②《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页。

⑨肖贵清:《毛泽东推进“两个结合”的历史性贡献》,《毛泽东研究》2023年第5期。

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①伟大实践,开创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逐渐得到重视,而部分学者常将文化论争上升为政治争端,以无端否定的态度频繁开展文化批判,这就造成社会思想处于极端沉闷之中。对此,毛泽东于 1956 年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强调“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②,旨在文化领域廓清政治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的边界,做到政治上分清敌我、学术上充分自由。但是,部分党员担忧在科学和艺术问题上享有充分自由是否会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否会忽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③。对此,他回应道,“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④。此后,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⑤。可以看出,毛泽东坚持从本民族的实际出发,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在多元并存的文化氛围中激发传统文化的生机和活力,并扬弃传统文化中的毒素和糟粕,从而使人们平等享受文化资源,切实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要。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文化主体性和历史延续性。毛泽东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和民族文化观,并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推动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既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又赓续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实践经验,进而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

态,筑牢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根基。

三 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脉络中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除了要正确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外,还必须科学汲取世界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为此,毛泽东在对世界文明进行深入研究基础上,倡导世界性、时代性内容与民族性形式有机结合,既表现出开放包容的宽广胸襟,又体现出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开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再造历程。

其一,以文明互鉴的理性观念观照世界文明。近代中西文明比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古今比较,亦即指以农耕文明为表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启蒙以来的西方现代文化时陷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境遇^⑦。对此,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就深感“今世学问之涂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人事日益蕃衍”,因而提出唯有“蕪其精”方能“志于学”^⑧的主张,即强调以取精用宏、兼收并蓄的态度借鉴和汲取世界文明的成果。譬如,对老师杨昌济所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毛泽东指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⑨。这种对东西文化予以理性评估的文化观念同李大钊早期主张“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进而“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⑩的调和式现代文化建设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⑩。1920 年 3 月,毛泽东在论述其暂不“出洋”的原因时指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

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②《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5 页。

③指 1957 年 1 月 7 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双百”方针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

④《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0、232 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 8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25 页。

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 年第 17 期。

⑦臧峰宇:《“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中国社会科学》2023 年第 8 期。

⑧《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0 页。

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73—74 页。

⑩《李大钊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13、311 页。

⑪吴汉全,刘宏伟:《李大钊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早期探索》,《新视野》2023 年第 5 期。

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①可见,毛泽东深信中华文明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要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脉络中重焕中华文明的历史光辉。尽管早期毛泽东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大气量之人”,力图“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表现出唯心史观的文化倾向,但其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②的现代化观念已然认识到世界文明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文明向往,触及到了时代发展的根本脉络。

其二,基于民族本位汲取世界文明成果。文明的发展具有继承性、联系性,没有中华民族的特色也就谈不上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毛泽东既主张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又强调文化的民族性,注重“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③,反映出积极而慎重的文化选择态度。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形态是立足中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为此,毛泽东极其重视学习世界文化时应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倡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观,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④。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⑤,汲取世界文化成果要有标新立异意识,学会“织中国的帽子”,“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⑥。质言之,文明的发展既离不开本民族的根基,又离不开世界文明的进程。毛泽东努力把握世界文化变革的潮流,力图在中外文明的融通中彰显中华文明的内在价值,并使之成为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不仅立足于民族本位接受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呼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这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⑦;而且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始终强调“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⑧,倡导“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⑨。

这些思想建构起了毛泽东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的立论基础和实践逻辑。

其三,推进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有机融合。历史表明,但凡有生命力的现代文明,往往是传统文明和世界文明有机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在承继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展开新诠释,进而明确提出把世界性、时代性的内容与民族性的形式有机结合起来,铸就中国式的现代文明形态。但需强调的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有机融合的根本前提首先在于弄清楚本民族现代化的思想资源,充分考虑自身的文化传统及其现代性转换的内在要求。正是基于对文化传统民族性的深刻认识,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是“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⑩。从根本上说,毛泽东之所以基于民族本位对文化问题展开深刻思考,乃是由于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能够将民族文化问题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多要素互动的过程性存在,伴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新的内容,这也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根本特质或内在规定性需要通过具体的“民族形式”得以阐发,进而同世界性、时代性的内容有机融合。譬如,毛泽东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⑪,“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⑫。可见,毛泽东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性阐发中指明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有机融合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民族性和世界性高度统一的文明新形态,是基于历史积淀的文明创造,既彰显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和当代价值,又顺应人

①《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8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3、2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⑪《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⑫《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类文明发展的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毛泽东从强调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要占个半壁的地位”,到倡导传统文化应当通过具体“表现形式”彰显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性特质,可见民族本位和民族自信意识始终贯穿其思想演变的始终。而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将“古今中西之争”转换为文化古今相通与文明交流互鉴,而且在民族复兴的实践创造中进一步把握中华文明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有力地推进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有机融合。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十年艰难而辉煌的战斗生涯中,毛泽东同志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①从以上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第二个结合”的理论逻辑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脉络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其中内蕴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 and 实践,既表现出源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创造性思维,又彰显出超越西方现代化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的独创性特质,为新时代构筑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重要的

历史基础,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思路和实践指引。

从整体性视域来看,毛泽东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具有如下重要特征。第一,毛泽东的现代文明建设思想自成体系、独创性发展,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毛泽东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是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并成为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文明根基。第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贯穿于毛泽东现代文明建设思想始终,开启了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现代化自主实践进路。第四,“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毛泽东现代文明建设思想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始终立足于人民本位和民族本位之上。

总之,毛泽东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行了独创性的艰辛探索。这一探索贯穿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为新时代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重要的历史根基,也奠定了毛泽东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探索先驱者的历史地位。

Mao Zedong's Exploration and Contribution to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DUAN Zhiwen & LIU Hongwei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is a great pioneer in explo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Mao Zedong grasped the law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and mad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create the basic form of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long the ideological process of “people’s great unity—building a new country of the Chinese nation—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Mao Zedong actively explore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pat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He not only advocated the scientific attitud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o trea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emphasized the shaping of Chi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with firm historical self-confidence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civilization, Mao Zedong observed the world civilization with the rational concept of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 and drew the achievements of world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national standard,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world civilization.

Key words: Mao Zedong; modern civi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23 年第 6 期。